

生产网络与区域创新论丛

丛书主编 曾 刚



空间冲突是基于命令—控制型权力关系的要素垂直配置与地方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层级式非协调关系，空间冲突不一定是不同层级主体利益博弈的结果，相同的利益诉求也可能导致空间冲突。空间冲突的治理需要改革内部治理机制和政府强势管理机制，增加地方参与区域管理决策，提高不同空间层级组织行动的协调程度。

我国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 空间冲突及治理机制研究

Spatial conflict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Vulnerable Ethnic Ecological Region in China

程 进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生产网络与区域创新论丛

丛书主编 曾 刚

我国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 空间冲突及治理机制研究

程 进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国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空间冲突及治理机制研究/
程进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 9

(生产网络与区域创新论丛)

ISBN 978 - 7 - 5141 - 6065 - 9

I. ①我… II. ①程… III. ①民族地区 - 生态环境 -
环境治理 - 研究 IV. ①X321. 242.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7356 号

责任编辑: 王长廷 刘 莎

责任校对: 杨晓莹

责任印制: 邱 天

我国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空间冲突及治理机制研究

程 进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2 印张 220000 字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6065 - 9 定价: 4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总 序

2011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其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提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及对生产生活的重大影响。2012年4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发的《制造:第三次工业革命》对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随着云计算技术、通信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原材料、劳动力、资金等生产成本因子不再是决定区域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子,而知识、信息和人才等创新因子地位快速跃升,传统生产区位被区域创新系统所超越。福特制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柔性生产方式所取代,通畅、高效的网络成为企业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来源,区内创新网络合作成为区域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第三次产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彼得·迪肯(Peter Dicken)在其著作《全球性转变》中描述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关系时指出:“全球化并非某种不可避免的终结状态,而是一组复杂、不确定的过程,很不均衡地发生在时空之中。由于这些过程,世界不同部分相互联系的本质和程度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因此,生产网络的知识、人才、信息等创新要素的区域流动过程及其与区域创新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也就成为社会各界特别是与区域经济有关的科研、管理、经营人员非常关注的问题。

受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全球化和地方化这两种力量交互作用,塑造了全球经济格局。在高度全球化的世界里,经济马赛克相互依赖、共同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学家、经济地理学家对全球经济网络、地方内生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现了曼彻斯特学派(代表人物为Peter Dicken等)、集群战略学派(代表人物为Michael Porter等)、加州学派(代表人物为Allen Scott等)、欧洲创新环境学派(代表人物为Philip Cooke等)、关系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为Harald Bathelt等)。回眸国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影响力快速上升,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论文著作同步大幅增加,“中国热”正在升温。然而,尽管国内学术界已经基本完成了对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翻译引进,部分学者特别是部分海外华人学者已经开始结合中国国情、中国案例对西方学者的观点进行商榷讨论,但跟随、附庸西方主流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理论的风气并未

根本改变,与“中国学”兴起的时代要求和发展趋势有一段不短的距离。事实上,由于我国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市场环境、发展水平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经济发展之路、中国经济活动的目标、空间过程、组织、机理必然会呈现一些新的规律,迫切需要我们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关注新时期全球经济网络联系的新特点,开展深入的实证分析和系统的理论创新,为“中国学派”的创立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经济地理学发展历史悠久。其发端始于1953年浙江大学地理学整建制迁入华东师范大学之际。20世纪80年代初,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被批准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点和硕士点,成为国内第一批开展区域经济学、人文地理学高层人才培养的单位。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科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和上海市重点学科,成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地理学的核心力量。拥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科技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俞立中工作室3个省部级研究基地,成为国内最重要的人文经济地理研究基地之一。不仅拥有胡焕庸、李春芬、程潞、杨万钟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人文经济地理前辈,而且拥有刘君德、曾刚、杜德斌、宁越敏、谷人旭、吴永兴、丁金宏等一大批在国内外人文和经济地理学界有重要影响的当代学者,在经济地理与区域创新、城市地理与城市经济、世界地理与跨国公司、政治地理与行政区划、人口地理与城乡关系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本套丛书秉承理论创新与案例剖析相结合、全球态势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理论继承与理论创新相结合的原则,从网络权力、技术扩散、全球生产网络、区域创新系统、产业集群等视角出发,系统地论述了全球生产网络与区域创新发展、企业区位与产业集群演化、区域创新管理和区域创新环境建设之间的关系,不仅为海内外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参考,同时也为从事区域创新和企业管理的相关政府工作人员、企业家、行业协会工作人员提供借鉴。然而,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本套丛书必然存在一些问题,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在本套丛书的撰写、出版过程中,国内外学术界同仁、相关政府管理人员、企业家给予了大力支持,经济科学出版社的王长廷主任、袁激、刘莎等编辑为本套丛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特此致谢!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院院长 曾刚

2014年11月于华东师大丽娃河畔

前

言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不同尺度空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和广泛，局部环境、资源和经济问题对全球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加大。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对区域生态、经济和社会系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受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不是所有区域都呈现协调发展的局面，甚至部分区域还存在着较为尖锐的社会、经济、生态冲突和矛盾。国内外相关研究从不同视角研究了区域之间空间剥夺、资源冲突、经济冲突和环境冲突等不平等、不协调的发展问题，取得了一大批成果，但这些成果大多集中在不同区域或群体基于自身利益，对有限的资源的竞争而产生的一种水平方向上的矛盾、不协调的行为，忽视了垂直方向上不同层级空间利益主体之间在具有共同利益目标条件下的冲突问题。

与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类似，我国区域发展失衡问题十分严重。由于西部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恶劣，工作条件差，实地调研困难较多，且西部地区集中了我国 80% 以上的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环境特殊性显著，社会经济问题较为敏感。受此影响，国内有关区域冲突问题研究多集中在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重复建设、产业同构、能源原材料争夺以及市场封锁等经济冲突领域，西部地区相关研究严重不足。国家十分重视西部地区发展和稳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对西部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政策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提高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水平，但也存在一些不协调的因素和问题，

急需因应之策。考虑到我国西部地区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背景,考虑到西部地区稳定繁荣对我国国家生态安全、民族和谐的重要性,探讨我国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不同层级主体间的空间冲突问题,无论是对丰富以分析空间关系为己任的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还是对解决我国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现实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的空间冲突是不同空间层级间多个具有共同利益目标的个体或群体在区域发展互动过程中,因发展理念、文化观念的差异所产生的矛盾和不协调关系,并导致区域偏离协调发展的理想状态。由于我国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经济基础薄弱,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外部力量的大力支持,而独特的地方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和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决定了地方发展环境对外部扰动具有较强的敏感性,使得具有共同发展目标的地方主体与外部高层级主体之间产生空间冲突关系。因此,我国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空间冲突的本质并不是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和冲突,而是高层级行为主体主导的外部援助方式的地方不适应性,外来的资金、技术、知识、政策和措施等不仅没有实现地方可持续发展目标,反而在对接和互动过程中与地方行为主体产生了各种矛盾和冲突关系。

为了全面了解我国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空间冲突的现状和成因,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于2011年4月对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进行了深入调研。调研主要集中在甘南州的玛曲县、碌曲县、夏河县和合作市三县一市,共召开各种类型座谈会12次,涉及西北师大以及甘南州、县、乡(镇)等不同层级26个政府部门,共计座谈172人次。深入玛曲县各乡镇,共访谈牧户家庭13次,涉及39户、120人次。进行了10次野外实地考察,实地访谈110多人次,并考察了拉卜楞寺等3座具有代表性的寺院。在调研过程中主要采取了与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访谈、实地观测、小组内部讨论等方法,根据政府、企业和居民等访谈对象的不同分别采用了半结构化访谈、无结构访谈和群组访谈等方法。实地调研获取的大量信息为笔者系统分析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空间冲突提供了数据支撑。

从形成机理来看,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空间冲突是内生因素和

外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内生因素包括地方生态因素、经济因素和宗教文化因素。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地方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稳定性较差,加上居民大多信奉藏传佛教,对外部干预敏感性强;其次,外生因素包括全球化和区域空间层级关系。全球化指世界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治理的共同性,其本质是通过同化力,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空间尺度的顺利流通。在全球化背景下,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区域发展的主旋律。同时,从区域空间层级关系来看,我国“自上而下”分为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州、县、乡镇等多个行政管理层次。中央制定的政策措施有时并不能完全适合某个低层级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由于我国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的经济、生态和宗教文化环境具有地域独特性,当上级行政主体制定的政策措施不太符合地方情况而强行实施时,就容易产生空间冲突矛盾。

从类型和表现形式来看,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空间冲突依据两个标准进行类型划分,一是行为主体,二是发生领域。空间冲突的行为主体表现出明显的层级特征,不论是高层级行为主体,还是地方层级行为主体,都具有一致的目标和根本利益,即实现地方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也就决定了不同层级行为主体之间的空间冲突并不是利益争夺或目标分歧冲突,而是共同的利益目标前提下不同空间层级主体行为的非协调性关系。区域发展的目标在于获得经济利益、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实现社会效益,因此高层级和地方层级行为主体之间产生的空间冲突关系也都集中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生态治理等领域。根据高层级和地方层级等行为主体以及社会、经济和生态等发生领域两大划分标准,可以将我国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空间冲突分为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经济冲突、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社会冲突和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生态冲突三种不同类型。空间冲突表现形式是对各空间冲突类型的细化、拓展和具体阐释,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社会冲突主要表现为外来文化观念与地方民族文化观念的冲突、外来生活方式与地方传统生活方式的冲突、现代教育模式与地方传统教育模式的冲突三个方面;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经济冲突主要表现为外部经济援助方式与地方自我发展的冲突、外部推行的生产方式变革面临地方生态和文

化双重考验两个方面；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生态冲突主要表现为生态保护制度的地方不适应性、外来生态技术与地方性生态知识的冲突、生态保护措施与民族宗教禁忌的冲突三个方面。

从空间冲突的治理来看，空间冲突的治理需要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同时发挥作用。我国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空间冲突是由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笔者认为，仅依靠单一的地方力量或外部力量很难有效地治理空间冲突，空间冲突的治理与协调需要从构建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入手。在治理甘南藏族自治州空间冲突过程中，一方面应该注重发挥地方力量的积极作用，充分尊重、保留一些尊重自然、关注生态的优良文化传统习俗，充分发挥寺院等宗教群体在社会、经济和生态管理的积极作用，将宗教群体纳入政府主导的公共管理轨道，实现传统宗教文化与现代管理方式的互补互动，引导当地藏族居民逐步接受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改进和完善外部援助方式和内容，将投资重点由当前的基础项目建设逐步转移到人才和文化交流的财政支持，建立以外部提供资金、内部决策重心下移、多管理层级合作的新型区际联动机制，提高投资项目、政策措施与当地州情、民情的有机联系，进而大幅度提升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可持续协调发展能力和水平。

本书得到华东师范大学曾刚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研究（10ZD&01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生态文明的区域发展模式研究（41071093）”等课题研究的支撑。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专家给予了指导和帮助，甘南藏族自治州相关部门在实地调研中给予了大力支持，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刘莎老师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谢。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的空间冲突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科学命题，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文中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程 进

2015年7月5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可持续发展成为区域发展模式的重要内容	1
二、层级式空间关系深刻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	2
三、空间冲突问题制约了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3
四、经济地理学理论创新的现实需求	5
第二章 空间与空间冲突	7
第一节 区域冲突与空间冲突	7
一、空间	8
二、冲突	10
三、区域冲突	11
四、空间冲突	12
第二节 空间冲突研究动向	13
一、冲突的形成因素	14
二、冲突的类型划分	19
三、冲突的表现形式	21
四、冲突的演化过程	22
五、冲突的社会影响	24
六、冲突的协调治理	25
七、冲突的研究方法	26
八、研究总结	28

第三章 空间冲突相关基础理论回顾 30

第一节 经济地理学空间关系研究演进 30

一、区域内部产业空间配置与布局竞争 30

二、跨区域尺度的空间组织 31

三、全球尺度的空间网络关系 32

第二节 全球化与地方化：理论的争辩 36

一、地方化、全球化以及全球地方连结 36

二、对全球—地方连结的反思 39

第三节 空间冲突相关理论渊源 40

一、社会冲突理论 40

二、博弈理论 42

三、区域管治理论 45

第四章 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空间冲突形成机理 50

第一节 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特殊的地域类型 50

一、生态脆弱区分布与特征 51

二、少数民族地区分布与特征 55

三、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分布与特征 59

第二节 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空间冲突的内生因素 61

一、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与敏感性 62

二、经济结构的低效性和单一性 65

三、民族宗教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 70

第三节 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空间冲突的外生因素 72

一、经济全球化及产生的趋同效应 73

二、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层级关系 76

第四节 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空间冲突的产生 77

第五章 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空间冲突的

类型及表现形式 80

第一节 空间冲突产生背景 80

一、民主改革时期 (1949 ~ 1958 年) 81

二、曲折发展时期 (1959 ~ 1977 年) 82

三、恢复发展时期 (1978 ~ 1988 年) 83

四、扩大开放时期 (1989 年至今) 83

第二节 空间冲突类型划分 84

一、空间冲突划分标准 84

二、空间冲突类型 88

第三节 空间冲突表现形式 90

一、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社会冲突表现形式 91

二、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经济冲突表现形式 93

三、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生态冲突表现形式 94

第六章 甘南藏族自治州空间冲突的类型及表现 97

第一节 甘南州区域概况 97

一、经济发展特征 98

二、生态环境特征 99

三、社会文化特征 100

第二节 甘南州空间冲突的演化过程 100

一、空间冲突隐性阶段 (1949 ~ 1958 年) 101

二、空间冲突萌芽阶段 (1959 ~ 1977 年) 102

三、空间冲突显性阶段 (1978 ~ 1988 年) 103

四、空间冲突扩大阶段 (1989 年至今) 104

第三节 甘南州空间冲突的类型 105

一、甘南州空间冲突行为主体 106

二、甘南州空间冲突发生领域 109

三、甘南州空间冲突类型划分 113

第四节 甘南州空间冲突的表现形式 114

一、社会生活冲突表现形式	114
二、经济发展冲突表现形式	119
三、生态治理冲突表现形式	124

第七章 甘南藏族自治州空间冲突形成机理 及治理机制

129

第一节 甘南州空间冲突形成机理

129

一、甘南州空间冲突产生的内生因素	130
二、甘南州空间冲突产生的外生因素	141
三、甘南州空间冲突的产生	145

第二节 甘南州空间冲突治理困境

147

一、地方力量治理空间冲突的困境	148
二、外部力量治理空间冲突的困境	149

第三节 甘南州空间冲突治理机制

150

一、甘南州空间冲突内部治理机制	151
二、甘南州空间冲突外部治理机制	153

参考文献

156

第一章

导 论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不同尺度空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和广泛,局部环境、资源和经济问题对全球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加大。区域发展的实践表明,资金、人员、技术等要素的空间流动可能形成区域间的合作或冲突关系,从而对区域发展模式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从我国欠发达地区现实发展情况来看,区域间的要素流动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十分有限,基于命令—控制型权力关系的要素垂直配置与地方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层级式空间关系,这种层级式空间关系突出表现为由经济势差、制度势差、技术势差造成长期稳定的要素单向配置过程,以及欠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的资源依赖与关系依附。

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是典型的欠发达地区,其生态脆弱性和民族聚居地特征的叠加使得基于区域等级关系的要素单向配置和垂直扩散特征十分显著,相较其他落后地区,根据区域发展实际需要进行自我调节的能力更弱,从而削弱了区域自主性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陷入“弱者更弱”的发展怪圈。因此,正确认识层级式空间冲突关系的形成过程和机理,研究要素垂直扩散条件下典型欠发达地区区域治理的影响因素、方式、路径和绩效,对于完善经济地理学基于空间竞合关系的区域发展理论,以及指导我国欠发达地区层级式空间冲突关系下的区域治理和协调发展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可持续发展成为区域发展模式的重要内容

环境、资源和经济问题是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高,诸如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矛盾尖锐化等全球性问题日益严重,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不同尺度区域之间的空间联系更加密切和广泛,世界范围内的资源要素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得到配置,在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同时,也使得区域性问题的联系日益密切、复杂,增强了环境、资源和经济问题对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面对存在的问题,《我们共同的未来》、《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哥本哈根协议》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明确把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密切联系在一起,系统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区域协调、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的全球性共识。

从区域发展的视角来看,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形成一种最适合当地实际人地关系的协调发展模式。由于区域人地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这就决定了不同尺度区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要素流动,进而对区域人地关系演化以及可持续发展模式产生影响。因此,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区域内的可持续发展,即实现区域内部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经济增长一般认为是传统区域发展模式的首要目标,劳动力、资源、资本、市场、成本和规模经济等是区域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全社会开始对传统的区域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并充分意识到生态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生态环境逐渐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目标,生态环境因素由传统的区域经济发展的附属要素转变成为区域发展模式中的核心要素。二是区域间的可持续发展,即区际可持续发展的联系。对不同类型区域而言,资源禀赋、自然条件、社会状况、经济结构等影响因素的差异都决定了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不同,并相互施加影响。随着不同尺度区域间要素流动由传统的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代表的经济要素的流动转向生态、环境要素的流动,区域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单个区域内部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更需要强调不同尺度区域之间在人地关系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以及由此构成的区际协调结构。

二、层级式空间关系深刻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

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区域发展的理想模式,由于客观存在空间分层,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行政权力等级体系和经济势差、制度势差、技术势差等空间关系,这种等级体系导致区际要素垂直分层配置,并影响到区域协调发展和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产业集群等微观尺度基于技术权力的层级式空间关系较早得到关注,研究表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集群存在着明显的等级体系与等级制度,产业集群中被强势组织者主导着的分层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层级关系,而是有着鲜明的强联系和不均衡的权力关系,从而存在层级分层现象(Depner, 2005)。企业之间的关系逐渐由平等向不平等方向演化,特别是中心领导型模式的产业集群具有最高的层级性,集群内中小企业仅仅是为大型龙头企业分级配套。这种层级式空间关系对产业集群及区域创新与升级路径产生影响。个别具有知识、技术等资源优势的结点处于区域创新网络的中心地位,垂直协作关系较强,核心企业技术优势突出,由于集群内部权力越来越难被突破,跟随企业对核心企业存在较强的依赖性,显著的层级式特征可能对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有利,但会对包括技术升级在内的功能升级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地方在进行创新体系构建时,应充分考虑到产业集群的层级性特点,探索适合集群层级特征的产业创新升级方式(林兰, 2013)。

与微观尺度的层级式空间关系相比,区域尺度的层级式空间关系也开始得到关注,受区域的区位、规模及功能的完备性和开放程度影响,区域同样存在着层级特征(冯邦彦, 2008)。由于区域之间具有经济势差、制度势差、技术势差等空间关系,从而形成了强势区域对弱势区域的空间剥夺(方创琳, 2007; Barceló, 2009)。区域剥夺指的是强势区域对弱势区域的不公平、非合理的剥削行为,描述的是区域间的单向作用关系,区域剥夺的本质是社会资源和要素空间配置不公平问题,弱势区域的资源、资金、技术、人才、生态等处于被剥夺状况(袁媛、吴缚龙, 2009; 宋伟轩等, 2013),多是基于利益竞争、掠夺以及不平等贸易等前提条件。除经济势差、制度势差、技术势差之外,区域之间还存在明显的行政权力等级体系,这种等级体系导致区际要素垂直分层配置,在具有共同的利益目标前提下对区域发展形态产生影响。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区域外部力量施加的影响对区域内部人地关系演化起到很大作用,层级式空间关系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不断加强,因此区域的发展问题已超出了区域的空间范畴,需要深入剖析不同空间层级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突破长期以来就区域论区域的区域发展模式研究局限。

三、空间冲突问题制约了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与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类似,我国区域发展失衡问题十分突出。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但各个地区之间由于自然资源、区位优势、文化背景以及产业基础等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发展基础和条件。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由于受地方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引发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冲突,地方保护、区域分割、合作缺失,各自为政(王泽强,2008),东部发达地区在重复建设、产业同构、能源原材料争夺、市场封锁等方面表现出的经济冲突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治理都需要外部的大力支援,但地方独特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造成外部力量与地方力量难以实现有效互动,使得不同空间层级利益主体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生态治理等方面产生系列不协调关系,不仅破坏了区域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而且引发或加剧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是典型的欠发达地区,我国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全国陆地国土空间的55%,且主要分布在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①。由于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生态脆弱,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社会文化环境具有特殊性,社会发展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较为敏感,使得西部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的发展关系到全国的生态安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由于生态功能重要,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的区域治理主要通过生态治理的方式进行,受区域发展条件限制,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域区域治理的层级性特征非常显著,长期以来依赖国家和省级行政区域给予资金支持和技术指导。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南州)是我国三大藏区之一的安多藏区的文化中心,是藏族重要聚居地之一,地区社会经济活动和生态治理是在特殊的藏传佛教文化情境中展开的。甘南州的生态建设不仅关系到当地生态环境问题,而且关系到黄河中下游的生态安全问题,州内大部分区域属于我国主体功能区划中的“禁止开发区”,其高寒高原、黄河水源、藏民聚居、经济落后的自然与人文特征极具生态保护价值。甘南州生态危机具有典型性,各种经济和生态问题相叠加,危害程度更大,如何协调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是该地区亟须解决的难题。长期以来,甘南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治理得到中央、甘肃省及其他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项目方面的大力支持,截至2013年底,为修复生态系统、促进经济发展,国家持续对其投资151亿元用于围栏养殖、

①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国发〔2010〕46号). 2010.